

对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之关系的几点思考

叶自成

内容提要 国际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但中国能不能和平发展,不仅是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影响问题,而且更主要是一个中国与外部环境如何互动的问题,大国能够改变和塑造环境;一个国家不仅在和平发展的顺境中能够发展,而且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也能发展,关键是一个国家的领导集团如何选择国家的基本战略;一个国家的内部环境状态对国家的影响大于外部环境,而良好的国内环境也可以改变或缓和外部环境对本国的不利因素;在全球化时代,仅有和平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实现良性的和平发展;对中国而言,现存的国际秩序也是重要的外部环境,新秩序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很长时期内,维护现有秩序的合理因素应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

关键词 和平发展 国际环境 国内环境 国际秩序 良性发展

中国提出的和平发展观念,在 20 多年的实践中,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年人们争论的一些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在如何认识当今国际形势特征的问题上,争论要不要和平发展已经没有太大意义,实践证明,在这个存在许多地区冲突的世界上,和平发展仍然是国际局势的基本发展趋势;至于中国要不要融入世界体系的问题,中国也通过加入 WTO 等实践作了回答,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已经成了一个事实。

* 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邮编:100871)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 年 9 月 4 日。

中国的和平发展在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部分已经得到了人们的重视而且有了初步的思考。正如胡锦涛所说:“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人类的发展进步,民族的繁荣富强,应该也只有通过和平发展道路才能实现。”

但在这些问题上,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人们继续深入思考。

一、中国的发展:与国际环境的互动

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就需要对中国的国际环境进行全面、客观和系统的分析。

环境,本意是指周边的情况、因素、条件、影响或势力的综合。国际环境,是指一个国际社会的基本的、客观的、能对世界各国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和条件,它既指对所有国家都产生影响的外部因素和条件,也指对某些特定国家产生作用和影响的、特定的地区和周边环境。国际环境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既是国际关系结构体系对一国的影响,也是一国对国际关系结构体系的影响所作出的反应,是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和影响的一种互动过程。

过去人们关注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问题,主要是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环境来提出的。中国要和平发展,就需要一个和平的、对中国相对友善的外部环境。中国当然需要这样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任务,仍然是维护和争取这样一个外部环境。但是,人们开始认识到,在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关系上,仅有这样的认识是不够的。中国领导人开始指出,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而不仅是一个中国被动适应的关系。

国际环境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中国不能控制和回避的;但中国的和平发展则既是一个客观存在,也是在中国政府和领导者的决策影响下推动和进行的一个主观选择的过程。国际环境能推动、改变或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也能适应、影响、改变国际环境;当国际环境与中国和平发展的目标一致时,两者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当国际环境有利或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时,如果中国应对得当,则可以利用其有利因素或克服其不利因素,继续推进和平发展;相反,中国和平发展战略选择失当,或应对国际环境的不利因素失当,即使在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可能受阻;当然,如果国际环境的挑战和压力太大,超出中国应对环境的范围和能力,中国的和平发展也会受阻。

过去20年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了较多的有利因素,使中国的和平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而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对国际环

境的影响力也在增加。

在未来 15—20 年里,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互动将步入一个新阶段。一方面,仍然存在着继续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压力、要求、期望、挑战都比过去大大增加。同时,由于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发展方面也有了更大的能力,中国正确的战略选择将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产生积极的影响,两者会进入一个良性的互动进程;相反,如果中国的战略选择失当,则会加大国际环境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压力和挑战,反过来又会增加中国和平发展的困难和阻力。

因此,今天中国的学者应当进一步思考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关系,有必要深化人们对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关系的认识。

如果把国际环境分成和平、战争、不战不和三种环境,那么对国家的发展而言则有三种结果,即好、较好、不好三种可能,而不同的国际环境,通过国家领导决策层对国际环境的把握,也有适应、比较适应、不适应等三种不同的选择并转化为不同的结果。这样,三种国际环境通过国家决策层的三种反应就会出现 27 种不同的结果。

首先,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促进其发展的环境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只有外部的和平环境才能促进发展。日本过去在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中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大大促进了日本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发展,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发了横财,在二战后成为超级大国……中国之所以选择和平发展的方式,之所以最需要、最珍爱和平的国际环境,不是因为只有和平才能发展,也不仅仅是因为国际环境对中国形成的合力,以战争来求发展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更主要的是中国自身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是一种自觉的认识。“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只有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发展才是持久的牢靠的发展,也才是既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有着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又有着中国发展的历史根源”;它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也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中华民族历来讲信修睦,崇尚和平,中华文化历来强调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和平发展也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所以,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其次,一个国家能否发展,外部环境的客观因素很重要,但国家内部的主观因素也很重要,甚至比外部环境更重要。现在人们强调和平外部环境的重要性,很容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

胡锦涛:《在伦敦金融城市长萨沃里举行的欢迎晚宴上的讲演》,《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1日。

易形成一个结论,似乎中国的发展只有在顺利的外部环境条件下才能发展。这或许颠倒了二者的关系。实际上,在同样较好的外部环境条件下,不同的国家其发展存在至少三种可能的结果:发展好、发展不好、介于二者之间。同样是冷战结束、全球化,为什么只有东亚发展较为顺利,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不那么顺利;甚至同处东亚,为什么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发展较慢?同样,在不太好的外部环境条件下,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也同样存在至少三种可能的结果:发展得好、发展不好不坏、发展不好。一战后,苏俄没有什么好的外部环境:作为一个红色孤岛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比较紧张,西方国家对其封锁制裁,甚至发动军事战争来消灭它,但苏俄不但挺过来了,而且取得了较大发展。

第三,小国一般只能适应环境,但大国不仅能适应环境,也能创造和改变环境。如前所述,国际环境通常主要是指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格局,指国际体系、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秩序等。小国在这些方面是无能为力的,大国则可以根据环境的情况来选择自己的战略。苏联是当时的一个大国,它没有去适应当时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创造了华约、经互会等国际组织,这在当时就成了苏联创造的国际环境的一部分;而美国作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也并非完全去适应已有的、西方为主的国际体系,而是主导建立了联合国、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北约、美日安保条约、七大国首脑会议等组织、秩序、机制。今天人们所谓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环境,主要是指美国当时创造的这些组织和机制。苏联和美国的例子说明,大国不仅适应环境,而且具有一定的让环境适应自己的能力。同样的道理,中国近年来不仅是在适应国际环境,也在创造和改变环境方面进行了较大的努力。温家宝总理曾明确指出,中国要“努力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在创造国际环境的努力中,最有成效的成果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二是与俄罗斯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三是与印度改善和发展关系;四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达成了自由贸易区协议,中国加入东盟和平友好条约。这些举措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也是中国自己创造的、对自身有利的国际环境的组成部分。正如胡锦涛所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

所以,一个国家有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固然是一件幸运的事;但是,一个国家能否发展,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一个国家能否适应和利用当时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大国,与国际环境的关系也决不仅仅

《温家宝总理会见美国总统布什》,《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1日。

《国家主席胡锦涛同美国总统布什会晤》,《人民日报》2005年9月15日。

是适应环境的问题,中国也具有一定的改变环境、让国际环境适应中国和平发展的能力。中国要有面对各种国际环境变化的心理准备:在国际环境较好时,应当抓紧利用;如果国际环境变化、恶化时,也应当想办法适应环境,并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局部环境来发展自己。

二、以国内环境良性发展化解国际环境的不利因素

与上面的分析相连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的关系。“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这两方面是一个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有利于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这一问题有两个层面,一是国内环境如何适应和利用国际环境的问题,另一个层面是大国的国内环境本身就是国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一个良好的或恶劣的国际环境,为什么在不同国家会造成大不相同的发展结果,其中主要的答案就是:外部环境只是一个国家变化发展的条件之一,但却不是唯一的因素,对大国来说甚至不是决定性的、最重要的条件。在这方面,小国与大国的情况也很不相同。小国经不起外部环境的较大压力,常常受大国决定的影响而发生重大变化;但对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外部条件当然会影响到中国的内部变化,但更主要的是外部条件只能通过内部条件起作用。

因此,对大国来说,能不能适应环境,有没有能力把握当时国际环境的发展趋势,就成为国家能否利用良好的外部环境来促进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

构成一个国家利用外部因素的主观因素的要素包括: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品质与素质;国家领导集团对国际环境的认识与分析是否客观和准确;国家能否集中资源用于有利于国家的主要发展方向上;国家的政治是否稳定。在这些方面,中国是一个内在因素比外在因素更起作用的国家。因为中国本身有着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政治经济制度也与其他国家都不同。在这一方面,中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有。毛泽东领导中国的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可能是最不好的,中国几乎与所有大国的关系都不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很乱,国内又有左倾错误影响,但毛泽东认定中国必须独立自主,集中全国资源发展“两弹一星”,这使今天的中国都受惠不浅;当然,当时的中国也错过了许多利用新的技术革命来发展自己的机会。改革开放时期,则是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很好地把握国际时机来发展自己的另一种类型。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固然重要,但中国内部的稳定、团结,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可能比外部

胡锦涛:《加强互利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人民日报》2005 年 11 月 12 日。

环境的好坏更重要。它使中国能适应和利用外部环境创造的机会,也能在外部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创造和改变环境来发展自己。

第二,既然中国的变化本身就构成国际环境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国内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际环境的一部分,正如美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是构成中国外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因此,中国自身的建设就已经超出了中国的范围,具有了一定的国际性。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问题也是发展问题的组成部分。正如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一样。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构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贡献率已经超出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而它产生的两方面的问题是:一方面,要反对外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但也要适当理解其他国家对中国各种问题的合理关切;另一方面,中国自己要自觉地从国际的眼光来审视和处理各种内部问题,既要首先考虑中国自己的立场和利益,也要适当考虑他国的感受和关切。

第三,以国内环境的顺利发展化解国际环境中的敌对因素。面对国际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当然必须做艰苦的工作,既要斗争,又要和解,但许多国际的不利因素可能更需要从国内发展的角度来化解。

先以人权问题为例。人权是西方国家的一个基本价值观。西方国家试图把西方国家发展人权的做法作为一个普世的模式,由此构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一个主要矛盾。在西方眼里,一个不尊重人权的国家难以成为国际社会的文明的成员,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有可能构成对西方制度的威胁。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国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方面,中国当然要批判西方人权高于主权、以人权为由干涉中国内政的倾向,同时也要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中国对外宣传的质量,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但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很大部分还在于中国国内的发展状况。实际上,西方越来越多的人之所以认同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的人权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胡锦涛2005年11月19—21日在与到访的布什会谈时,也强调指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人权取得了显著的历史性进步。我们将继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中国人民的意愿,不断建设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不断提高中国人民享受人权的水平”。如果这一方面能取得重大成就,将会大大化解西方民众对中国的疑虑乃至敌意,大大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

同样,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当然要做好以武力遏制“台独”的准备,这绝对是必要的,但也要认识到,在这方面与美国的矛盾可能会升级。因此,中国更需要做好

《胡锦涛主席与布什总统举行会谈》、《中美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1日。

另一方面的工作,加快大陆的发展,使大陆对台湾民众更有吸引力,同时也要做好台湾民众的工作,争取更多的台湾人反对台独,认同两岸和平统一的理念。大陆方面通过邀请台湾主要政党访问大陆,采取对台湾民众有利的实际政策,大大缓解了两岸的紧张局势,压制了台独的势力,也大大提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中美之间的矛盾。

三、不仅是和平发展,而且是和平的良性发展

中国和平发展,对中国而言,就是指中国不以武力作为国家发展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和平发展的对立面是非和平发展。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既定国策,也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

因此,今后中国固然要继续宣扬和平发展的思想,但重点已经不是要不要和平发展,而是如何和平发展的问题,中国应当而且已经在深化和平发展的内涵。除了中国过去提出的“共同发展”外,胡锦涛在2005年11月9日访问英国的讲话和11月20日与布什会谈时又提出,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和平的发展,而且也是“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和平发展还是非和平发展的矛盾,而是粗放式发展、旧式发展与新式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的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发展之间如何协调关系的矛盾,是良性发展与劣质发展的矛盾。

以武力谋发展固然会被国际社会视为威胁,但虽然和平却是劣质的发展,即粗放式的、破坏性的、污染性的、浪费型的、自私的发展,仍有可能被视为威胁。小国的劣质发展,有可能不被视为威胁,但大国的劣质发展很可能被许多国家视为威胁。所以,在和平发展的口号提出20多年后,现在又提出了中国不仅和平发展,而且与国际社会和谐发展的口号。中国的“和平发展”应当修正为中国“和平的良性发展”。所谓和平的良性发展,就是中国的开放发展、合作发展、科学发展、共同发展和自我克制的发展。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发展中的“两大矛盾,一是不发达的经济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要靠发展;二是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要靠科学发展”,因此,中国“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其根本要求,就是要坚持把发展作为治国理政的第一要

胡锦涛:《在伦敦金融城市长萨沃里举行的欢迎晚宴上的讲演》,《人民日报》2005年11月11日;《中美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1日。

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同时,要创新发展模式,走科学发展之路,更加注重统筹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降低资源消耗,保护生态环境”。

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前述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之关系的延伸和深化。

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国家,任何问题乘以 13 亿人口都可以被放大成国际性问题。因此,今天中国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国内问题,而是已经开始成为国际性问题,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这些问题中,中国发展中出现的污染、资源问题尤其突出。

中国处于环境保护与经济矛盾的矛盾之中。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不能把很大的资源用于环境保护,但中国又不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那种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因此,中国现在必须以人均才 1000 美元的能力办理西方国家在人均产值达到 4000—10000 美元才开始办的事情。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不能不治的程度。西方国家是经济发达造成了环境污染,而中国经济还不发达,环境污染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

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报告指出,2004 年中国有 298 个城市受到酸雨的影响,酸雨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30%,7 条最大的河流和 27 个大型湖泊受到污染,只有 1/3 的城市污水和 57% 的城市的垃圾得到处理,3 亿农民饮用不卫生的水。流经城市的 90% 的河流严重污染,75% 的湖泊出现了富营养化,三分之一的城市空气严重污染,工业危险废物每年生产 1100 多万吨,处理率只有 68%,城市垃圾年清运量 1.49 亿吨,无害化处理不到 20%。据统计,2004 年中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为 263 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 27.46%;全国沙化土地面积为 174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18.12%,且具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面积还有 31.86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 3.32%,涉及上千个县,并且还以每年 2460 平方公里的迅速扩展,危及 1 亿多人口的生活。所以,“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土地荒漠化和沙化的总体形势仍然是很严峻的”。

中国的发展也引发了中国资源紧张的问题。中国土地资源已经敲响警钟。2004 年,中国耕地面积减少为 18.37 亿亩,8 年中全国耕地面积减少 1.14 亿亩。中国水资源短缺很严重,现在每年缺水 400 亿吨,全国有 400 多个城市缺水,90% 的城市供水条件恶化。中国的粮食产量只能达到 5 亿吨,还缺 2 亿吨,每年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约 5000 万吨粮食。中国是个石油消费大国,2002 年全球的石油消费为 35 亿吨,其

温家宝:《走科学发展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人民日报》2005 年 9 月 7 日。

《环境问题制约经济威胁健康》,《人民日报》2005 年 4 月 23 日。

国家林业局:《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人民日报》2005 年 6 月 17 日。

《我国人均耕地降为 1.41 亩》,《人民日报》2005 年 3 月 30 日。

中美国为 8.88 亿吨,占 25%,日本为 2.49 亿吨,占 7%,中国为 2.48 亿吨,也占 7%,中国原油进口 2004 年超过了 1 亿吨,预测到 2010 年左右,中国石油的 41%即 12000 万吨将要在国外进口,2020 年可能净进口 21000~45000 万吨。

中国的资源不仅短缺,而且浪费巨大。统计表明,我国万元 GDP 能耗是发达国家的 4 倍多,工业排污则是发达国家的 10 倍以上。“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世界的 4%左右,但原煤、钢材、水泥的消耗量分别占全世界消耗量的 31%、30%和 40%,石油、铁矿石的进口依存度分别达到 40%、60%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经超出环境容量。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既不符合国情,也会引发各种矛盾,最终难以为继,已经到了需要刻不容缓地加以转变的关键阶段。”

中国这种以污染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的发展,不仅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威胁,而且也对世界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会成为引发新的“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因素。所以,中国尽管和平发展,但如果这种发展是劣质发展,一样会被国际社会视为威胁而不被接受。

因此,保护自然环境和厉行节约,不仅是中国国内的发展战略,而且也要作为中国和平发展总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国已经提出要转变发展思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发展循环经济,发展节能产业,从黑色 GDP 转向绿色 GDP 等一系列整治中国陆权发展的观念。

总之,中国不仅要和平发展,而且还必须是科学、和谐、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只有科学、和谐、可持续地发展,才能长期坚持和平发展;这也将是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贡献。一个和平的中国 + 一个绿色环保节能的中国,这就是中国的发展必须走和正在走的道路。

四、和平发展的中国：在现行秩序与新秩序之间

国际秩序是国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

以上参见:牛文元、胡鞍钢:《能源的压力与挑战》,陈锡康等:《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的挑战》,载路甬祥主编:《21 世纪中国面临的 12 大挑战》,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2—84、220 页;张洁:《中国能源安全中的马六甲因素》,《国际政治研究》2005 年第 3 期。

曾培炎:《深刻理解 建议 的基本思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人民日报》2005 年 10 月 31 日。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首席专家牛文元等认为,广义的绿色 GDP 是现有的 GDP 中扣除经济发展牺牲的环境、社会虚数(如灾害、疾病),狭义的定义是扣除自然资产损失之后的、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它要看单位 GDP 中消耗的能源、水、原料,释放多少污染物,以及全员生产率、单位土地面积的财富等。传统的 GDP 是不快乐的 GDP,而绿色 GDP 是让人快乐的 GDP,甚至有人认为,GDP 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的主观幸福感。见牛文元等:《让 GDP 快乐起来》,《国际先驱导报》2005 年 1 月 1 日。

中国确定和平发展,加入现有的国际体系,遵守现行的国际秩序,已经解决了中国与现存国际秩序的主要问题。只要中国坚持这一原则,就不会与现有的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冲突和矛盾。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必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中国一方面努力遵守现行秩序,另一方面又提出要建立国际新秩序,而建立需要所有国家有共识的国际新秩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没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是不会有结果的,那么在新秩序没有形成之前,中国将如何对待现行秩序?是遵守现行秩序为主,还是以推动新秩序的形成为主?

在中国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关系上,应该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中国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关系,不是融入世界还是改变世界的关系,也不是遵守现行秩序还是推翻现行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关系,而是要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逐步改变世界、改造和改良国际秩序,亦即在现有国际秩序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国际秩序。

第二,中国既是现有秩序的受害者,又是现有秩序的获益者。中国是现有秩序的受害者,表现在自近代以来,中国备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压迫,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不公正的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有些后果至今仍未消除。台湾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旧秩序之不平等、不公正的产物。而作为现有秩序的获益者,则表现为:大国在现行的国际体系中的特权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中国也是五个拥有这个特权的国家之一;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又是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获利者,借助于国际资本、技术、商品的自由流动,中国在现行的国际贸易秩序中得到了较大利益。

第三,对现有秩序应有合理的分析,不能不加以区别对待。现有秩序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两个部分,包括公开的规则和潜规则两个方面。一方面,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准则构成了现有秩序的基础,它们是现有秩序中的合理成分,不能抛弃。它们虽然是西方国家创立的,但也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成果,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这种文明的一种反映,所有它们应该得到继续维护和遵守;另一方面,大国特权、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强权政治,以西方文明为中心、将西方价值观作为普世性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以及发达国家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组织中的优势地位,则是现有秩序中不合理的、潜规则的部分。

第四,即使对现有秩序中的不合理部分,也要区分为不合理但符合现阶段实际、合理但不符合现状和既不合理也不符合现实情况三种情形。前者如大国特

其最新表述,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 21 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05 年 7 月 2 日。

权,它不合理,应当完全予以取消,但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有存在的必要性,这种说法不仅仅是维护中国的既得利益,而且也是联合国改革、维护世界和平、解决世界主要问题等所必需的;现阶段是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形成的过渡期,大国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享有某种特权,对维护国际社会的权威和实际运转是必要的。第二种情形如大国拥有核武器和核不扩散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现行秩序的组成部分,它基本合理,但却不符合现状:如果大国可拥有核武器,为什么印度就不能合法拥有?而如果印度、巴基斯坦等都有了核武器,为什么朝鲜、伊朗就不能拥有核技术?最后,美国在现行秩序中的特权地位的问题。美国借助自己的强势绕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明显违反国际法,是违法行为,但却未受到任何约束和惩罚。

第五,由于形成新秩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在现阶段,中国在国际秩序方面应该以遵守和维护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准则为主。这不仅仅是因为现行的国际秩序对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而且也是因为中国倡导的新秩序的大部分内容,在现阶段都难以被国际社会全体成员所接受,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